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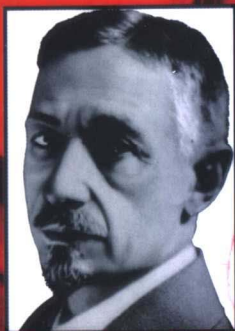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

柳鸣九 主编

蒲宁精选集

顾蕴璞◎编选



Series Sele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外国文学名家
精选书系

蒲宁精选集

顾蕴璞 编选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蒲宁精选集 / (俄)蒲宁著;顾蕴璞编选.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5.4

ISBN 7-5402-1682-4

I. 蒲… II. ①蒲… ②顾…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6661 号

责任编辑:李剑波 杨韶蓉 李江华

蒲宁精选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27.5 印张 739 千字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编者简介

顾蕴璞，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作协会员。一九三一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九五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并留校执教直至退休。著有《莱蒙托夫》、《诗国寻美——俄罗斯诗歌研究》等论著，编有《莱蒙托夫全集》、《叶赛宁研究论文集》、《普希金精选集》、《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等多种编著，译有莱蒙托夫、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普希金等多位俄罗斯诗人的专集或合集，所译《莱蒙托夫全集2·抒情诗II》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译者简介

刘宗次，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张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姜明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

戴聪，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

王立业，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杨怀玉，博士，西安航空工程学院外语系讲师。

章其，资深教授，已故。



蒲宁像



蒲宁1927年摄于法国格拉斯
(右侧是妻子蒲宁娜，左侧是女秘书库兹涅佐娃)



蒲宁于1933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
(前排右起第一人是蒲宁)



俄罗斯沃罗涅日市蒲宁故居
(1870年他诞生于这幢楼内)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兹编辑出版“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种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每批十种。

本书系在已经出版了四十种的基础上,计划总共达到八十至一百种,以期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文经典文库。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兹表示深切的谢意。

柳鸣九

二〇〇三年一月

编选者序

流而不亡的文学大师 ——俄罗斯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蒲宁

顾蕴璞

和我国读者喜爱并熟悉的十九世纪的屠格涅夫一样,跨越十九、二十两个世纪的伊凡·阿历克谢耶维奇·蒲宁(1870—1953年)也是在俄罗斯创造了文学的辉煌,终因不愿受制于本国的政治制度而流亡法国的,他还自称“我是得到法国的周全照顾的流亡者”(见《受奖演说》)。所不同的是,蒲宁流亡的时间(33年)比屠格涅夫(21年)更长,前后经历的政治氛围的反差更大。但有一点两人又是十分相同的:身居法兰西国土,心系俄罗斯文学,法国的侨居环境同样都未能中止他们用俄语为俄罗斯文学宝库继续提供精品。另外,他们都以俄国文化旅行者的身份在西欧汲取异国文化营养的同时向世界传播俄罗斯文学成就,当十九世纪的西欧人开始侧目而视俄罗斯文学这座新的高峰时,就有屠格涅夫的一份功劳。而蒲宁也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把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民族文学成就向世界做了最好的展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和屠格涅夫一样,蒲宁也是在政治的层面上流落到国外,寄人篱下,但在文化的层面上仍卓有成效地继续用一颗俄罗斯的心写出本民族文学的杰作,并把它推上二十世纪文学创作的世界高峰。蒲宁流亡国外如此之久而生活经常如此窘困,但所取得成就却如此之大,原因就在于他虽久处异域文思始终没有枯竭,他的秘诀是充分调动他那丰富的记忆宝库,他长年累月地在记忆中咀嚼人生,从而获得了用之不竭的新的创作源泉。因此,蒲宁和屠格涅夫一样(不,

比他更有资格),成了世界文坛上罕见的流而不亡的文学现象。

伊凡·阿历克谢耶维奇·蒲宁,一八七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俄历十日)出生在俄罗斯沃罗涅日一个渐趋破败却热爱文学的贵族家庭。在农奴制取消将近十年之后,他“从小就在衰败了的贵族之家长大”。父亲阿历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蒲宁,是个贪酒好赌之徒,放荡挥霍,常使母亲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流淌伤心的泪水,把家庭推近破败的边缘,全家不得不从沃罗涅日迁往奥尔洛夫省叶列茨县祖父的布蒂尔基田庄,后寄居外祖母的奥泽尔庄园。蒲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家族为俄罗斯贡献了不少国务活动家、将军、御前大臣及其他官级的官员。而在文学领域中,著名的有安娜·蒲宁娜(卡拉姆津曾称她是‘俄罗斯的萨福’)和瓦西里·茹科夫斯基。后者是土拉省地主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蒲宁与被俘的土耳其女人萨利哈的非婚生子,由于这个缘故,茹科夫斯基用的是自己教父的姓……从母系方面说,我属于丘巴罗夫的贵族世家。这也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根据我们家族的传说是在彼得大帝时代被剥夺了公爵爵位的家族……我的所有的祖先都同老百姓和土地联系着,父系和母系方面祖祖辈辈都是中部俄罗斯拥有领地的地主。这是一片肥沃的半草原,在这里,莫斯科的沙皇为了保卫国家免受南方鞑靼人的侵袭,从各个不同的俄罗斯地区的移民中建立了掩护部队,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里形成了最丰富的俄罗斯语言,并且从这里涌现了以托尔斯泰为首的几乎所有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① 蒲宁关于家史的上述自述,定位了他作为一个俄罗斯大作家产生的民族土壤和人文生态环境。尽管作家并不对自己的贵族血统忘乎所以,但贵族家族破落的悲剧却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早早留下了烙印。他对平民知识分子乌斯宾斯基等人的自毁行为感到纳闷,对纳德松、迦尔逊等人的夭折倍加关注,对人的存在之谜的探索怀有浓厚的兴趣。人生的短暂、脆弱和易受伤害震撼着蒲宁敏感的心灵,而孤独(无同龄人)和故乡的无边辽阔

^① 《蒲宁回忆录》,蒲宁著,李辉凡译,东方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一月。

更强化了这些苍凉的情绪。作者正是“在极其幽深的田野寂静里，夏天一直延伸到家门口的庄稼地里，冬天则在雪堆中间”度过了他那“充满忧伤和独特的诗情的童年”的。

庄园的生活使蒲宁从曾是农奴的邻居多少领略了农奴制的残酷，从母亲和侍女们学到不少民谣和传说，从与民间的接触熟悉了人民的语言。受家境下滑的影响，蒲宁在上中学时经常拖欠学费，他本人对教学的枯燥死板也感到厌倦，终于发展到被勒令退学的地步。正在这个时候，哥哥尤里·阿历克谢耶维奇被监禁一年多后流放到乡下来。尤里曾是哈尔科夫民意党领导人，于一八八四年因参加革命而被捕，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曾获大学副博士学位。他比伊凡·蒲宁大好多，像父亲对待孩子似的对待他，指导他自修完中学的课程。从思想到学业对他产生了有力的影响。这和他在此以前接受一位年老而酗酒的破落贵族作为家庭教师的教学效果（对这位家教所讲授的毫无兴趣）不可同日而语。

在家庭彻底破败的情况下，十九岁的蒲宁出外谋生，先后到过奥廖尔、哈尔科夫、波尔塔瓦等地攻读“人间大学”：当过报社校对员、采访员、图书管理员、地方自治局统计员，此外，还摆过书摊卖过书。据他自己在给哥哥尤里的信中透露，他受尽了屈辱和艰辛，有时穷得被迫点头哈腰，有时使劲干活却反遭百般挑剔，被人当鞋匠一般吆喝。他在《奥廖尔导报》社干活时结识一位名叫瓦里娅·帕先科的姑娘，相恋并同居两年，终因瓦里娅的父母认定他无法给自己女儿提供生活的保障而分手，这件事给蒲宁的心灵造成不小的创伤。

一八八七年蒲宁在《祖国》周刊上首次发表诗作（抒情诗《乡村乞丐》），一八九一年在奥廖尔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诗集《1887—1891年诗歌集》（以《奥廖尔导报》副刊的形式）。以后的十年中，蒲宁又连续出版了《在露天下》（1898年）、《诗与故事》（1900年）、《田野的花朵》（1901年）、《落叶》（1901年）、《新诗集》（1902年）等五个诗集。一八九二年起，蒲宁开始小说的创作。当年的《俄罗斯财富》杂志刊载了他的第一篇小說《乡村速写》。一八九五年，《新言论》杂志刊登了他的另一个短篇《浪迹天涯》，作者成功地描写了

为饥寒所迫从乌克兰家园远迁乌苏里边疆的农民的生活,获得文坛“散文中的诗”的美誉。一八九七年,蒲宁的第一部小说集《浪迹天涯》问世,作为小说家的蒲宁在读者心目中诞生了。如果说,蒲宁早期的抒情诗主要是歌颂俄罗斯大自然的迷人与和谐,那么,他的早期小说主要是描绘大自然遭到破坏的背景上贵族的衰落和农民的贫困以及流露作者对昔日庄园无比缅怀的惆怅之情。短篇小说《安东诺夫卡苹果》(1900年)可以说是上述小说中的佼佼者,曾被誉为“近年来散文中的杰作”。蒲宁开始用人与自然的新视角来观照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把现实主题与永恒主题熔于一炉。

自从一八九五年辞去《奥廖尔导报》的职务去莫斯科后,他结识了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巴尔蒙特、勃留索夫等人,这对他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托尔斯泰对他的影响尤深,他对托翁的宗教道德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立志以他为榜样,尝试过平民化的生活。据悉,托尔斯泰是蒲宁一生崇拜的三个文学之“神”中的一个(另外两个是普希金和契诃夫)。

蒲宁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开始和最先获得社会承认的。第一首诗和第一篇小说的发表前后相差五年,第一部诗集和第一部小说集的出版前后相差六年,这都是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事。二十世纪伊始,蒲宁于一九〇三年因诗集《落叶集》的创作以及美国诗人朗费罗长诗《海华沙之歌》的翻译获得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文学奖,而一九〇九年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的名誉院士,获此荣誉的原因虽未公布,但不言而喻是综合性的,既有他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也有他在小说创作、翻译甚至文论等方面所作贡献。

《落叶集》中的主旋律诗篇《落叶》,是俄国“白银时代”(1893—1917[或1925])流派纷呈、多元互补的诗歌大潮中三大流派(现代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代表之一的蒲宁在新派诗走红的条件下所写旧派抒情诗的代表作,是时代新旧交替时期俄罗斯写景抒情诗的一种典范。勃洛克以其诗界权威的分量说:“蒲宁的诗作越来越成熟和老练了……蒲宁的诗句和他的世界观是严整和质

朴的,那是多么可贵,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那么独特,我们应该从他的第一本书、第一首诗——《落叶》起就承认他有权在当代俄国诗坛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①大概从《落叶》问世时起,蒲宁还在俄国诗坛获得了“秋天、忧愁和贵族之家的歌手”的美誉。对于以《落叶》为代表作的诗人蒲宁,高尔基甚至作出了当时最高的评价,称他为“当代第一诗人”。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文坛上,略晚于象征派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是以高尔基为首的集结在知识出版社周围的一批具有民主倾向被称为“知识派”的作家和诗人群,蒲宁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和库普林、安德列耶夫、绥拉菲莫维奇、魏列萨耶夫、普里什文等同属一个阵营,但从创作来说,蒲宁与上述作家同以现实主义为主导风格外,仍保持自己作为“来自贵族的……最后一位作家”(高尔基语)的特点,并在白银时代大胆进行反传统的艺术探索的潮流的影响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诗歌和散文的艺术革新。更确切些说,他是传统派中的革新派或革新派中的传统派,因为任何人都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而存在,不管他如何出于对民族文化的感情本能地抵制现代派这个舶来品。例如在现代派艺术思潮泛滥的“白银时代”,蒲宁一方面在《在山中》一诗中唱道:“诗不在世人所谓的诗中,/它在于我的继承有多丰,/继承愈丰,我愈是诗人。”但另一方面,他的艺术思维并没有对现时代封闭,他不但在小说中广泛采用象征手法,而且也在一些诗中采用了他并不爱用的隐喻手法,如《悲伤的乌黑放光的睫毛……》这首仅十二行的诗中竟用了三个隐喻。在《月出》这首诗中采用了现代派诗人所热衷的双向比喻的翻新手法即与传统相似的手法(如莱蒙托夫的《囚邻》)已实践了象征派所说的“艺术感染力的扩展”。在散文领域,蒲宁更早已不是在墨守成规地继承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他已把矛头从指向社会制度的弊端转向人性的弱点,把

^① 阿·巴博列科:《伊凡·蒲宁——传记材料》第一一八页(转引自冯玉律《论伊凡·蒲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

热衷于争斗的社会主题变成追求和谐的永恒主题,与着眼于道德、宗教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异曲同工之妙。

蒲宁对划分文学流派不感兴趣,但对旅行却十分迷恋。一八九七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候鸟的迁飞是由于内分泌的作用:在秋天激素分泌不足,到春天则分泌过剩……我一生都跟候鸟一样!”^①——蒲宁是个真正的旅行迷,在二十世纪初的十几年间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九〇〇年十一月,首次旅行去了瑞士、德国和法国,一九〇二年四月又赴土耳其两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他出游法国和意大利,一九〇七年他游历了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九一一年二月他从红海出发,经过索马里,渡过印度洋,到了锡兰岛,一九一四年三四月间他去了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访问了罗马、萨格勒布、布达佩斯等城市。如果不是健康的原因,他已曾打算去新加坡、中国香港、上海、长崎等亚洲城市旅行。八方旅行对积淀蒲宁的文化底蕴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对人类古代文明的寻访,对人类四大宗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教义的探究,对人生真谛的思索可见于许多抒情哲理诗(如《鸟影》、《太阳神庙》、《犹太》等)和不少中短篇小说中。

一八九八年,蒲宁曾和一位侨居俄国的希腊革命家美丽的女儿察克尼结婚,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就因性格不合而和她离异。一九〇七年,蒲宁再婚,对象是维拉·尼古拉耶夫娜·穆罗姆采娃,与她感情投合,相互厮守到老。这位妻子极有文学修养,对蒲宁日后的文学创作帮助极大。同年,蒲宁翻译的美国诗人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出版,译本又获得俄国科学院普希金文学奖。同年,蒲宁的诗文集《在宽阔的天空下》问世,博得文坛的好评。

二十世纪最初十六年,即十月革命前的一个时期,是蒲宁创作的鼎盛时期,重心由诗歌转向小说,他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如中篇小说《乡村》、《苏霍多尔》(又译旱峪)或《故园》)和短篇小说《欢乐

^① 维·穆罗姆采娃-蒲宁娜:《蒲宁的一生》,巴黎,一九五八年,第一〇二页(转引自冯玉律《论伊凡·蒲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七月,第八页)。

的农家》、《轻轻的呼吸》、《旧金山来的先生》等，都完成于这一时期，是小说家蒲宁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他在彼得堡等本国大城市待得不长，以乡居为主，也经常出国旅行。在文艺思想上，这一时期蒲宁对乡村的看法已经定型。他对乡村情有独钟，并认为整个俄罗斯都是个乡村。他忧心忡忡地望着俄罗斯乡村：从一九〇五年革命到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再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俄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蒲宁对他们的贫困处境和无权地位满怀同情，也已意识到俄罗斯的变革势在必行。一九〇九年四月，蒲宁在航行途中对一个持右派观点的政法学校学生争辩说：“若是把轮船垂直地切一刀，便会看到：我们在这里边喝酒边聊天，而工人却在闷热的机房里，浑身煤黑，操劳不停……最主要的是，坐在上面的人还不把那些给他们干活的人当人看待——这公平吗？”^① 蒲宁的民主思想是和反暴力观念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他也“渴望革命”，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俄国贵族的生活风俗和内心世界是同庄稼汉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贵族阶层的物质条件比较充裕而已”，“两者的灵魂都是俄罗斯的”。^② 蒲宁用人性的弱点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不平与冲突。这就是二十世纪头十年前后蒲宁的基本创作思想之一。这一时期他所写中篇小说《乡村》（1910年）和《苏霍多尔》（1911年）以及其他乡村题材的短篇小说都贯彻了这一创作思想。

《乡村》的问世，虽然引起不同的反响，但它标志着蒲宁最富成果的创作时期的开端。《乡村》于一九一〇年发表在《当代世界》杂志上。作品反映的是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斯托雷平特别反动的时期的俄国农村，主人公克拉索夫兄弟俩——季洪和库济马，是地主杜尔诺沃农奴的后代，他们的曾祖父被地主的猎狗咬

^① 阿·巴博列科：《伊凡·蒲宁——传记材料》，第一三五页（转引自冯玉律《论伊凡·蒲宁》）。

^② 同上，第一六八页。

死,祖父当过小偷,父亲已是个商贩,但到了季洪手里,又上升为富农,而且由于善于经营而发了迹,把剥削过曾祖父和祖父的地主杜尔诺沃一家的庄园兼成自己的家产。弟弟库济马却是另一种人,有才气、爱读书、能写诗,还信奉托尔斯泰主义,但因时运欠佳终于沦为流浪汉。兄弟俩生活的社会背景是日俄战争、一九〇五年革命、解散国家杜马、死刑、枪杀、查封报纸、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和形形色色的怪现象:受宪兵欺压者反而息事宁人,为他们打抱不平者反而被拘留,有个庄稼人为了十五个戈比竟让老婆陪人家睡一夜,村子里养的孩子几乎都死光,养的狗几乎都被杀光,庄稼汉只会说“下流话,偷懒,撒谎,不知羞耻,对谁都不信任”。蒲宁在危机四伏的乡村的社会背景上塑造了两个性格截然相反但在对前途的悲观认识上惊人地一致的主要人物,给读者的信息是:在这个象征着整个危机重重的俄国的乡村,无论是随波逐流的小贩的哥哥季洪那两只“疯狂的眼睛”,还是忧国忧民的真理探索者弟弟库济马那双“忧伤的眼睛”,都看不到走出乡村困境的出路。

《乡村》的发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进步的评论界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高尔基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给他的信中写道:“以前还没有人这样深刻、这样历史地写过农村……我看不到有什么作品能同您的东西相比,我被它感动了——很受感动。我觉得,这种深藏在心头的为故乡所发出的悲叹,这种高尚的忧国忧民之情十分可贵,而所有这一切又是一个崭新的现象……那时正派的人们便会说:除其第一流的艺术价值之外,蒲宁的《乡村》是一个推动力,它促使风雨飘摇中的俄国社会反省,目前应考虑的不只是有关农民的问题,甚至不只是有关普通人民的问题,而且是俄罗斯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把俄罗斯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过,而这部作品则为我们指出,必须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历史地考虑问题。”^① 与高尔基等人不同,某些自由派评论家持相反的态度,指

^① 《高尔基研究资料》,第五十二至五十三页(转引自冯玉律《论伊凡·蒲宁》第一〇二页)。